

物质—观念视域下育龄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

——基于 CGSS2021 问卷实验的分析

王毅杰 白 杨

摘 要: 当前我国已迈入低生育社会, 探究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真实影响因素、出台相应政策、释放多孩生育潜力是应对人口问题的重要举措。基于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实验模块的数据, 从物质条件和观念因素两个层面探究其对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 居民对二孩生育持略微开放态度, 但三孩生育意愿较为消极。物质层面的家庭收入、父母照料支持和优质育儿服务均能提高多孩生育意愿。就观念而言, 性别偏好不再影响多孩生育意愿, 但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仍有着正向影响, 且对家庭收入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 物质层面的城乡异质性小于性别, 城乡二元生育格局发生变化, 经济在城市二孩生育意愿上的效用大于农村; 父母提供隔代照料会增加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 当经济能力允许时, 男性比女性更期望生育三孩。研究结果表明, 生育政策应着力于有一定潜力的二孩生育, 推动支持型的家庭生育政策、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建立整体性的生育支持体系是走出低生育陷阱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 物质; 观念; 多孩生育意愿; 生育政策; 问卷实验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 (2024) 01-0157-11

作者简介: 王毅杰,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白 杨,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DOI:10.13644/j.cnki.cn31-1112.2024.01.007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要素, 人口结构失衡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主要体现为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总和生育率偏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 15—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 2010 年的 70.1% 下降至 2020 年的 63.4%,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由 13.3% 上升至 18.7%, 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首次超过 0—14 岁少儿人口。^① 新生人口趋势同样不容乐观,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从 2016 年开始, 我国出生人口连年下降, 由 2016 年的 1883 万人, 下降到 2022 年的 956 万人, 下降幅度达 49.2%。总和生育率更是在 2020 年下跌至 1.3, 远低于 2.1 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近期我国不断出台和调整生育政策以应对低生育率问题, 先后于 2013 年和 2015 年通过了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出台后, 2016 年新生人口出现了小高峰, 但从

^{*}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城市层级、市民化与流动人口‘补偿性’生育行为研究”(项目编号: 21SHB011)、河海大学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B2102071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 中国政府网,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5/11/content_5605787.htm, 2023-10-11。

2016年起,出生人口开始持续下降。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是否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还有待观察,但二孩政策的遇冷表明我国居民对生育的态度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变化正在经历剧烈的变迁。探究生育意愿的真实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生育政策、挖掘生育潜力,对缓解我国的人口问题有重要意义。在预测生育行为时,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被广泛采用。国内研究对生育意愿的测量一般包括三个指标: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①然而,因个体和环境差异,每个人在物质条件、观念及生活境遇上都不同。虽说已有研究将这些因素纳入了考量,但因测量误差、测量单位及问卷调查方式本身固有的内生性问题和因果推断上的缺陷,学界对当下公众生育的真实意愿以及确切影响因素仍然缺乏共识。^②为此,本文基于CGSS2021的问卷实验数据,在物质—观念视域下探究其对我国育龄群体多孩生育意愿的真实影响。

一、文献回顾

生育率下降是全球性问题,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2010—2015年,全球已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6,对低生育率现象的成因和低生育意愿的研究成为全球议题。^③已有研究主要沿着两条路径进行:一是宏观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二是对个体行动的微观分析,具体包括社会心理学范式,关注低生育背后的价值观和心理动机变化;家庭经济学范式,关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背后的生育需求和生育成本。我国的低生育率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早期生育率的下降是政策导向的行政性低生育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造成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随社会经济发展和限制性政策的取消,生育率的自然下降表明我国迈入了自发性低生育阶段,这成为我国当前生育问题的研究重点和难点。^④一方面,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成本提高加重了物质上的育儿负担,想生育的家庭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家庭模式的变迁,夫妇为中心的核心家庭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和子女观念,对新生家庭的生育观念和和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⑤总之,生育的物质压力和观念变迁是当下影响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两大重要维度,一直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

(一) 物质条件与生育意愿

生育包含生和育,前者对家庭,特别是走出家庭的职场女性来说是高昂的机会成本,后者则需要大量的直接经济投入。经济收入是影响生育意愿和行为最为直接的物质要素。不过由于样本和研究方法的差异,相关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经济促进论认为,家庭收入水平的增长能够抵消育儿成本的上升,家庭条件越好,再生育的意愿越强;^⑥经济抑制论认为,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不会促进,反而可能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⑦部分原因在于当前的家庭关系由以子女为主转为以夫妇为主,收入的增加改善了生活水平,注重生活体验可能减少了对生育的需求;非线性论认为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U”形关系,家庭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先下降后上升。^⑧

① 吴帆:《生育意愿研究:理论与实证》,《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4期。

② 风笑天:《当代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我们实际上知道多少?》,《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

③ 具体情况可参见联合国和世卫组织的相关报告:United Nations,“The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5 Revision”,<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2015-revision>。

④ 穆光宗、林进龙:《论生育友好型社会——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与治理》,《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7期;任远:《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在人口变动中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⑤ 杨菊华:《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转变研究》,《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⑥ 柳如眉、柳清瑞:《城乡收入增长、养老金与生育水平——基于扩展OLG模型的实证检验》,《人口与发展》2020年第3期;风笑天:《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⑦ 卿石松、姜雨杉:《夫妻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Liu, Z., Gong, Y.,“Income, Social Security and Chinese Families’ ‘Two-Child’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Urban Residents’ Fertility Intentions”,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Vol.65, No.6, 2020, pp.1773-1796。

⑧ 何明帅、于森:《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劳动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何秀玲、林丽梅:《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与经济收入关系较为密切的房价也被认为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快速上涨的房价导致生活压力增大和生活成本提高,对家庭生育存在负向“挤出效应”,降低了生育意愿。而对于有多套住房的家庭来说,快速上涨的房价是一种财富积累,可能对家庭的生育行为有促进作用。国外研究表明,房子作为财产在房价快速上涨时对生育有正向影响。^①国内研究也表明,家庭住房的财产属性及投资性房产对多孩生育有显著的正向财富效应,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相较于单套房家庭,多孩生育几率提高了24%。^②

相较于生产,养育方面的阻碍则是现代家庭考虑更多的实际问题。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家庭内的照料支持,二是家庭之外的公共服务支持。在家庭照料支持方面,由于我国的大家庭传统,加上女性抽离出家庭投身劳动力市场,隔代照料现象在城市中愈发常见,为子女带孩子成为父辈对子代新家庭的一种重要支持形式。隔代照料降低了家庭在育儿上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缓和了工作家庭冲突,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③国内研究几乎一致表明,父母的支持能缓解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减轻女性的生育压力,提高女性的再生育意愿。^④公共服务是国家弥补家庭养育能力不足、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和二胎意愿均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教育、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低保等公共服务满意度均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意愿生育数量。^⑤同时,公共服务质量还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收入和提升幸福感等,以间接的方式提高二孩生育意愿和转化生育行为。^⑥

(二) 观念变迁与生育意愿

除了物质上的压力,观念的变迁也是低生育意愿的另一个重要推手。从我国的历史文化来看,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特殊时期和传统文化观念形成的子女性别偏好,二是基于家庭角色的性别分工观念。在农业社会,男性的劳动力优势能降低家庭未来在经济上的风险,男性偏好源于男性的经济价值。同时,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父权制,财产继承和从夫居制是男性偏好得以长期存在的制度基础。^⑦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我国居民在生育意愿上的性别偏好,并造成了我国20世纪末21世纪初性别出生比的严重失调。

微观层面,家庭的性别偏好具体如何形成且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和行为一直是研究的重点。有研究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⑧性别偏好存在着代际传递作用,父母对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存在同向关系,即便在“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为主流意愿的城市女性中,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空间。^⑨有研究指出,性别偏好不受物质方面如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的影响,但受家庭成长环境和居住模式的影响,与公婆同住、自己有兄弟姐妹更倾向形成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偏好。^⑩不过,性别偏好也在发生变迁,“儿女双全”偏好是当下主要的偏好类型,其次是无偏好,纯男孩或纯女孩偏好的比例相对较低。^⑪家庭对子女的性别偏好也实际影响了生育意愿和行为。有研究表明,生育男孩的概率与母亲个人属性、家庭结构和婚姻模式相关,选

① Lovenheim, M. F., Mumford, K., “Do Family Wealth Shocks Affect Fertility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5, No.2, 2013, pp.464-475; Atalay, K., Li, A., “Housing Wealth, Fertility Intentions and Fertility”, *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 Vol.54, 2021, pp.1-8.

② 黄静、李春丽:《住房对家庭多孩生育的影响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4期。

③ 许琪:《性别公平理论在中国成立吗?——家务劳动分工、隔代养育与女性的生育行为》,《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④ 田艳芳、卢诗语、张莘:《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人口学刊》2020年第3期;李志华、茅卓彦:《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人口学刊》2022年第3期;于潇、韩帅:《祖辈照料支持对育龄妇女二孩生育间隔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22年第2期。

⑤ 梁城城、王鹏:《公共服务满意度如何影响生育意愿和二胎意愿——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⑥ 肖涵、葛伟:《公共服务质量对二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经济科学》2022年第1期。

⑦ 刘爽:《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

⑧ 宋健、陶椰:《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人口学刊》2012年第5期。

⑨ 宋健、秦婷婷、宋浩铭:《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人口研究》2018年第2期。

⑩ 靳永爱、宋健、陈卫:《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

⑪ 宋健、靳永爱、吴林峰:《性别偏好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夫妻视角下的一项实证研究》,《人口研究》2019年第3期。

择男孩的概率与家庭已生育女孩个数正相关,与已生育男孩个数负相关,人口流动与迁移有减弱家庭男孩偏好的趋向。^①性别偏好是二孩生育意愿的实际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②不只是男性偏好,夫妻中任意一方存在性别偏好都会显著提高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③不过,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从2008年开始呈下降趋势,目前已恢复到接近正常范围。种种迹象表明,性别偏好对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逐渐降低。近四十年来,我国男孩和女孩偏好呈弱化趋势,社会整体氛围正在由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④

性别是研究我国低生育现象的重要视角,^⑤主要与之相关的是性别观念,指的是男女应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规范、社会角色分工、性别关系模式及行为模式等。^⑥性别分工观念是性别视角的核心。我国传统性别观念的核心是基于家庭角色分工的“男主外,女主内”:男性从事家庭生计相关的活动,女性主要负责家庭照料。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女性走出家庭投身工作,传统的性别观念有所松弛。国内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的性别观念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女性的性别观念更趋于现代,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受教育机会、职业地位与政治身份促进了其现代性别观念的形成。^⑦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多集中于女性,国内研究几乎一致表明,女性的性别观念越传统,生育意愿越高。^⑧性别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也相对稳定,并不随社会变迁发生显著的变化。^⑨不过这类研究笼统地涵盖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并没有区分初次生育和再次生育。虽说有研究关注了性别观念对再次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超大城市的女性整体生育意愿偏低、性别平等会降低女性的再生育意愿。^⑩但受限于样本规模、变量操作及调查方式,性别观念对多孩生育意愿的真实影响仍待探究。

综上所述,国内在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面已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首先,虽说物质和观念是影响生育意愿最常见的两个维度,且学界已展开大量讨论,但已有研究多是仅物质或观念的某一方面展开研究,很少将二者同时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比较它们的城乡和性别差异。其次,物质和观念因素并非独立作用于生育意愿。观念是时代、生活环境和社会阅历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不易发生改变。观念对物质因素是否存在调节作用,也有待于探究。最后,现有对生育意愿的研究多是基于大规模代表性的问卷调查数据,面临着未观测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数据呈现出的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为此,本研究拟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CGSS2021)搭载的问卷实验模块数据,以问卷随机实验的方式克服测量偏差并回应上述问题。

二、数据、测量与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概率抽样,调查多方面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家庭信息,此外CGSS2021搭载了问卷实验模块以探究多孩生育意愿。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8—49岁的育龄群体,在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后,保留二孩生育意愿样本2676人,三孩生育意愿样本2690人。

-
- ① 李树茁、胡莹、闫绍华:《当代中国家庭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5期。
- ② 靳永爱、宋健、陈卫:《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
- ③ 宋健、靳永爱、吴林峰:《性别偏好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夫妻视角下的一项实证研究》,《人口研究》2019年第3期。
- ④ 侯佳伟、顾宝昌、张银锋:《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1979—2017》,《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 ⑤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 ⑥ Williams, J. E., Best, D. L., *Measuring Sex Stereotypes: A Multi-Nation Stud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pp.23-50.
- ⑦ 刘爱玉、佟新:《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 ⑧ 陈煜婷:《城镇就业人群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的效应》,《南方人口》2017年第1期;胡荣、林彬彬:《性别平等观念与女性生育意愿》,《求索》2020年第4期;黎黎、李凤萍:《传统性别观念、信息传播与女性生育意愿——基于育龄女性的问卷调查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
- ⑨ 姜春云:《性别角色观念与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基于性别差异和社会变迁视角的分析》,《兰州学刊》2022年第5期。
- ⑩ 何姗姗:《超大城市“新任妈妈”的再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社会建设》2021年第6期;杨晓蕾、钟如雨:《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财经科学》2023年第4期。

(二) 测量方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验法被认为是解决内生性问题和保证因果推断的黄金准则,但由于伦理和外部效度等问题,实验法在实际的研究中应用受限。^①调查实验兼具了调查法和实验法的优势。不同于以往单一的问卷调查,问卷实验通过对多个实验变量进行随机化,从而分析社会现象的多维构成和复杂决定因素。^②在统计原理上,问卷实验法利用随机化消除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系统性差异,从而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并保证了因果推断的准确性以及内部效度。^③实验调查法包含多种,CGSS2021 搭载的模块属于实验调查法中的析因实验(factorial survey),也称为因素调查,是一种情景实验。通过计算辅助的方式,对多个自变量进行随机组合,生成不同的情景,通过人们在不同情境下的反应探究生育意愿的真实影响因素。

CGSS2021 的问卷实验在家庭年收入、家庭照料、育儿服务和已有子女性别构成四个方面设置了虚拟情景,并随机分配给受访者进行回答。详细情景变量如表1所示,根据变量分类,二孩生育意愿共有 $3 \times 2 \times 3 \times 2 = 36$ 种虚拟情景,三孩生育意愿共有 $3 \times 2 \times 3 \times 3 = 54$ 种虚拟情景。在作答时,受访者会被随机给出二孩和三孩的生育情景。二孩生育情景例如:“32岁的王女士家庭年收入为15万,自己带孩子,家附近无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您觉得她应该生二胎吗?”三孩生育情景例如:“32岁的张女士家庭年收入为5万,父母或公婆帮忙带孩子,政府提供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已经有了一儿一女,您觉得她应该生三胎吗?”二孩生育意愿每个样本生成两次虚拟情景,得到观测值5352个;三孩生育每个样本生成一次虚拟情景,得到观测值2690个。

表1 情景变量介绍

情景变量	分类情况
家庭年收入	家庭年收入为5万元,家庭年收入为15万元,家庭年收入为50万元
家庭照料	自己带孩子,父母或公婆帮忙带孩子
育儿服务	无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市场提供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政府提供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
已有子女情况	二孩生育情景:已有一个女儿,已有一个儿子
	三孩生育情景:已有两个儿子,已有两个女儿,已有一儿一女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生育意愿。由受访者根据随机分配的情景后,对此情境下是否应该进行生育作出的评价,“不应该”到“应该”从1—5分进行排序,数值越大表示生育意愿越高。

2. 自变量。物质因素全部为实验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为5万元、15万元、50万元)、家庭照料(自己带孩子,父母或公婆帮忙带孩子)和育儿服务提供(无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市场提供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政府提供优质且低价的育儿服务)。观念因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代表性别偏好的已有子女性别构成,二是性别分工观念。前者为实验变量,后者为非实验变量。子女性别构成在二孩生育意愿测量中为“已有一个女儿”和“已有一个儿子”两项;三孩生育意愿测量中为“已有两个儿子”“已有两个女儿”和“已有一儿一女”三项,均为类别变量。性别分工观念由该调查中的两个题项构成:“相比于母亲,父亲不应当因为照顾孩子而放缓事业上的进取”,“为人母是对女性来说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分为1—5,两项加总为2—10的连续型变量,数值越高表示性别分工观念越传统。二孩实验变量和三孩实验变量的分布情况见表2和表3。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1=男性)、年龄、民族(1=其他民族)、户籍(1=非农户口)、婚姻(1=已婚)、受教育年限、职业经济地位、是否拥有房产(拥有房产=1)、已有孩子数

① 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

② Snidermansome, P. M., “Advances in the Design of Survey Experiment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1, No.1, 2018, pp.259-275.

③ 王森许、李子信、陈云松等:《调查实验法在社会学中的应用:方法论评述》,《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6期。

(1=多子)、理想孩子数(1=多子)。详细的变量描述见表4。

表2 二孩生育意愿实验变量分布

变量	均值(标准差)			观测次数
二孩生育意愿	3.110(1.389)			5352
情景变量(类别变量)	分类及占比(%)			
家庭年收入	5万(33.84)	15万(32.98)	50万(33.18)	5352
带孩子情况	自己带(49.68)		父母帮带(50.32)	5352
育儿服务	无低价优质 育儿服务(33.13)	市场提供低价优质 育儿服务(33.48)	政府提供低价优质 育儿服务(33.39)	5352
已有子女情况	一个儿子(50.92)		一个女儿(49.08)	5352

表3 三孩生育意愿实验变量分布

变量	均值(标准差)			观测次数
三孩生育意愿	2.127(1.318)			2690
情景变量(类别变量)	分类及占比(%)			2690
家庭年收入	5万(33.23)	15万(33.68)	50万(33.09)	2690
带孩子情况	自己带(51.12)		父母帮带(48.88)	2690
育儿服务	无低价优质 育儿服务(33.13)	市场提供低价优质 育儿服务(33.48)	政府提供低价优质 育儿服务(33.39)	2690
已有子女情况	两个儿子(32.12)	两个女儿(34.42)	一儿一女(33.46)	2690

表4 非实验变量描述表

非实验类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取值范围	样本量
性别分工观念	6.665	1.468	2—10	8042
性别	0.426	0.494	0—1	8042
年龄	36.162	8.146	18—49	8042
民族	0.076	0.265	0—1	8042
户口	0.432	0.495	0—1	8042
婚姻状况	0.733	0.442	0—1	8042
受教育年限	11.488	3.973	0—19	8042
职业经济地位	40.032	14.376	10—89	8042
是否拥有房产	0.513	0.500	0—10	8042
已有子女	0.385	0.487	0—1	8042
理想子女	1.745	0.679	0—3	8042

(三) 模型方法

二孩生育意愿测量时,个体面临两次随机生成的虚拟情景,分别在两个虚拟情景下回答了生育意愿。因而二孩生育意愿在个体层面是分层的,更适合用多层次模型进行分析。虚拟情景的是随机化的,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有更多的方差,产生更低的标准误,^①因此在分析二孩生育意愿时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三孩生育意愿只生成了一次虚拟情景,不存在个体层面上的分层,采用OLS进行估计,因问卷实验的变量满足随机性和外生性,OLS回归也可以获得自变量的无偏性估计。^②在检验生育意愿性别和城乡差异时,使用了条件上更为严苛的费舍尔组合检验。

① Auspurg, K., Hinz, T., *Factorial Survey Experiment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5, pp.88-91.

② Hainmueller, J., Hopkins, D. J. et al., "Causal Inference in Conjoint Analysis: Understanding Multidimensional Choices via Stated Preference Experiments", *Political Analysis*, Vol.22, No.1, 2014, pp.1-30.

三、分析结果

(一) 物质与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从表2因变量的描述统计可以看出，二孩生育意愿的均值为3.11，略高于中立值，三孩生育意愿则为2.127，几乎等于“不应该”。整体而言，当下我国育龄群体对二孩生育态度呈现略微开放态度，三孩生育意愿则不容乐观。

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的统计结果见表5。模型1的因变量为二孩生育意愿，模型1.1只纳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理想子女数都对二孩生育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男性、年龄越大和理想子女数量为多子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受教育年限越多，生育意愿越低。模型1.2在模型1.1的基础上纳入了物质因素变量。模型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与家庭年收入为5万的相比，家庭年收入15万、50万的，二孩生育意愿较高。子女照料方面，父母带孩子能显著提高二孩生育意愿。育儿服务方面，相较于市场提供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无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显著降低了二孩生育意愿，政府提供优质低价的育儿服务与市场提供没有显著差异。模型1.3在模型1.2的基础上纳入了性别观念因素。其中已有子女的性别构成并不影响二孩生育意愿，但个体的性别分工观念显著影响二孩生育意愿，性别分工观念越趋于传统，二孩生育意愿越高。

表5 多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

变量	二孩生育意愿			三孩生育意愿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2.1	模型 2.2	模型 2.3
性别	0.095* (0.043)	0.075 (0.040)	0.065 (0.040)	0.193*** (0.052)	0.207*** (0.048)	0.197*** (0.048)
年龄	0.009** (0.003)	0.009** (0.003)	0.008** (0.003)	-0.003 (0.004)	-0.001 (0.004)	-0.002 (0.004)
民族	0.084 (0.097)	0.025 (0.090)	0.033 (0.090)	-0.088 (0.118)	-0.128 (0.109)	-0.132 (0.108)
户籍	0.009 (0.049)	-0.016 (0.045)	-0.009 (0.045)	-0.096 (0.059)	-0.066 (0.054)	-0.061 (0.054)
婚姻状况	0.103 (0.057)	0.093 (0.053)	0.074 (0.053)	-0.070 (0.070)	-0.091 (0.064)	-0.112 (0.064)
受教育年限	-0.026*** (0.007)	-0.027*** (0.007)	-0.024*** (0.007)	-0.021* (0.009)	-0.018* (0.008)	-0.016 (0.008)
职业经济地位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0.002)	0.002 (0.002)
房产	-0.040 (0.046)	-0.034 (0.043)	-0.026 (0.043)	0.107 (0.056)	0.090 (0.052)	0.101 (0.052)
已有子女数	0.043 (0.052)	0.017 (0.048)	0.019 (0.048)	-0.133* (0.063)	-0.087 (0.058)	-0.085 (0.057)
理想子女数	0.348*** (0.050)	0.342*** (0.047)	0.325*** (0.047)	0.212*** (0.061)	0.238*** (0.056)	0.221*** (0.056)
家庭年收入 (5万为参照)						
15万		0.756*** (0.036)	0.756*** (0.036)		0.629*** (0.057)	0.630*** (0.057)
50万		1.487*** (0.036)	1.487*** (0.036)		1.224*** (0.057)	1.230*** (0.057)
父母照料支持		0.350*** (0.029)	0.348*** (0.029)		0.155*** (0.046)	0.156*** (0.046)
育儿服务 (市场提供低价优质育儿服务为参照)						
无低价优质育儿服务		-0.377*** (0.036)	-0.378*** (0.036)		-0.161** (0.056)	-0.163** (0.056)

(续表)

政府提供低价优质育儿服务		0.038 (0.036)	0.038 (0.036)		0.092 (0.057)	0.090 (0.057)
已有子女性别 (一个儿子为参照)						
一个女儿			-0.048 (0.030)			
已有子女性别 (两个儿子为参照)						
两个女儿						0.069 (0.057)
一儿一女						0.077 (0.057)
性别分工观念			0.066*** (0.014)			0.069*** (0.016)
常数项	2.786*** (0.180)	2.002*** (0.169)	1.615*** (0.190)	2.300*** (0.218)	1.450*** (0.208)	0.972*** (0.233)
样本量	5352	5352	5352	2690	2690	2690
Log likelihood	-9147.305	-8333.614	-8326.494	-4517.638	-4287.759	-4277.518
R ²				0.031	0.183	0.18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05, **p<0.01, ***p<0.001。

模型2的因变量为三孩生育意愿。模型2.1只纳入了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已有子女数和理想子女数都对三孩生育有着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男性、理想子女数量为多子的，三孩生育意愿越高；受教育年限越多、已有子女为多子的，三孩生育意愿越低。模型2.2在模型2.1的基础上纳入了物质因素变量。物质因素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与二孩相似。家庭收入对三孩生育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与家庭年收入为5万的相比，家庭年收入15万、50万的，三孩生育意愿较高。子女照料方面，父母带孩子能显著提高三孩生育意愿。育儿服务方面，相较于市场提供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无低价且优质的育儿服务显著降低了三孩生育意愿，政府提供优质低价的育儿服务与市场提供没有显著差异。模型2.3在模型2.2的基础上纳入了性别观念因素。其中已有子女的性别构成并不影响三孩生育意愿，但个体的性别分工观念显著影响三孩生育意愿，观念越趋于传统，三孩生育意愿越高。整体而言，物质和观念因素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不存在差异，呈现出相同的模式。

(二) 观念对物质因素的调节

表6是二孩生育意愿上观念对物质因素的调节效应。模型3.1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与性别分工观念的交互效应并不呈线性关系。性别分工观念趋于传统时，相较于家庭年收入为5万，家庭年收入15万的二孩生育意愿较高，家庭年收入50万的和5万的并无差异，即性别分工观念在中收入家庭中的促进作用更大。模型3.2的结果显示，性别分工观念越趋于传统，父母提供的照料支持反而会抑制二孩的生育意愿。可能原因是，性别分工观念越传统，越会觉得生育子女是自己的责任，不愿为父母增加负担，因此性别分工观念负向调节了父母支持在二孩生育意愿上的作用。模型3.3中，性别分工观念对育儿服务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已有子女的性别对所有的物质因素均不存在调节效应，为节省篇幅，统计结果并未在此展示。

表6 多孩生育意愿观念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3.1	模型3.2	模型3.3	模型4.1	模型4.2	模型4.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家庭年收入15万×性别分工观念	0.066** (0.025)			0.061 (0.039)		
家庭年收入50万×性别分工观念	0.003 (0.024)			0.123** (0.038)		

(续表)

父母带孩子 × 性别分工观念		-0.040* (0.020)			0.011 (0.032)	
无低价优质育儿服务 × 性别分工观念			-0.002 (0.024)			-0.007 (0.038)
政府提供优质低价 × 性别分工观念			0.030 (0.024)			-0.016 (0.040)
常数项	1.768*** (0.213)	1.484*** (0.201)	1.674*** (0.210)	1.371*** (0.213)	1.006*** (0.201)	0.922*** (0.210)
likelihood	-8327.689	-8327.530	-8331.135			
R ²				0.193	0.189	0.189
N	5352	5352	5352	2690	2690	2690

表6的模型4是三孩生育意愿中观念对物质因素的调节作用。模型4.1显示，性别分工观念趋于传统的家庭中，相较于家庭年收入5万，家庭年收入50万的三孩生育意愿更高。即在三孩生育意愿上，性别观念对高收入家庭的调节作用更强。性别分工观念在子女照料以及育儿服务方面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已有子女的性别对所有物质因素也均不存在调节效应，为节省篇幅，结果并未在此展示。

(三) 生育意愿的性别与城乡异质性检验

为检验多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在性别和城乡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的方法进行了分析。表7是性别差异性检验结果。在核心自变量上，只有物质层面的父母照料支持存在性别差异。如果得到父母的育儿支持，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则要显著高于男性。表明照料子女的负担更多落在女性而不是男性身上，父母提供隔代照料会增加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观念层面，无论是子女性别偏好还是性别分工观念，都不存在性别差异。三孩生育意愿的核心自变量方面，物质上只有家庭年收入存在性别差异，年收入50万的家庭，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三孩生育意愿，也侧面表明了“男主外”的传统观念，当经济能力允许时，男性比女性更期望生育三孩。观念方面不存在性别差异。

表7 多孩生育意愿的性别异质性检验

变量	二孩生育意愿		三孩生育意愿	
	女性—男性系数差	p值	女性—男性系数差	p值
家庭年收入15万	-0.069	0.282	-0.076	0.256
家庭年收入50万	-0.091	0.182	-0.262	0.016*
父母帮忙看孩子	0.129	0.020*	0.142	0.114
无低价优质育儿服务	0.067	0.200	0.042	0.368
政府提供低价优质育儿服务	0.038	0.294	-0.002	0.484
已有一个儿子	-0.050	0.246	—	—
已有两个儿子	—	—	0.112	0.192
已有两个女儿	—	—	0.097	0.252
性别分工观念	0.025	0.114	0.010	0.430

表8是多孩生育意愿因素的城乡异质性检验。在二孩生育意愿方面，核心自变量上只有物质层面的家庭年收入存在城乡差异，年收入50万的家庭中，与预期相反，农村反而比城市的二孩生育意愿更低。一般认为农村较城市更为传统，更遵从多子多福的观念，若在物质条件充裕的情况下会比城市居民更愿意生育。但结果却相反，国内也有类似研究发现，多孩生育意愿方面，经济因素在城市的作用已经超越农村。^①城乡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当下农村生育观念正在发生由“生”到

① 杨晓蕾、钟如雨：《家庭收入水平、性别观念与再生育意愿》，《财经科学》2023年第4期。

“育”的变迁，农村较城市而言缺乏育儿方面的公共和市场服务，优异的经济无法转化为优质的育儿服务，导致农村二孩生育意愿反而低于城市。另一方面，可能是城市育儿更为看重经济条件，较高收入才能为孩子健康成长提供保障，才会选择生育二孩。观念层面的因素均不存在城乡差异。在三孩生育意愿方面，物质和观念因素均不存在城乡差异。

表 8 多孩生育意愿的城乡异质性检验

变量	二孩生育意愿		三孩生育意愿	
	农村—城市系数差	p 值	农村—城市系数差	p 值
家庭年收入 15 万	-0.075	0.232	0.140	0.138
家庭年收入 50 万	-0.225	0.010*	0.176	0.094
父母帮忙看孩子	-0.043	0.356	-0.004	0.452
无低价优质育儿服务	-0.081	0.182	-0.099	0.250
政府提供低价优质育儿服务	0.025	0.358	-0.048	0.378
已有一个儿子	0.062	0.188	—	—
已有两个儿子	—	—	-0.132	0.190
已有两个女儿	—	—	0.008	0.460
性别分工观念	-0.021	0.156	0.068	0.052

四、结论和建议

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探究低生育水平的成因、提高生育率以破解生育难题，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 CGSS2021 的问卷实验，在随机化消除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系统差异、保证因果推断准确性的情况下，从物质和观念两个维度探究了当下我国育龄群体的多孩生育意愿，主要有以下发现：

首先，整体而言，我国居民对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持不同态度。二孩生育意愿略高于中立态度，拥有一定的潜力和空间。三孩生育意愿则趋近于消极态度，不容乐观。

其次，物质条件和观念因素影响居民的多孩生育意愿。物质层面而言，家庭年收入对多孩生育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越高，对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越呈开放态度；父母的照料支持能提高子女的多孩生育意愿；无论来自政府还是市场，优质的育儿服务都能提高多孩生育意愿。观念层面，子女性别偏好不再是影响子女多孩生育的影响因素，性别分工观念影响依旧显著，性别分工观念越趋于传统，多孩生育意愿越高。物质和观念对二孩、三孩的生育意愿的作用呈现出相同的模式。

再次，观念对物质条件在多孩生育意愿上存在调节效应。性别分工观念对中等收入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有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父母的照料支持却有负向调节作用。在三孩生育意愿上，性别分工观念在高收入家庭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结果体现了性别分工观念在物质因素调节上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传统性别观念在家庭收入上的正向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在父母支持上的抑制作用，即性别分工观念越传统，越倾向认为照顾子女是自己的责任，不愿为父母增添负担，父母的支持反而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

最后，多孩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父母照料上的支持能提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高家庭收入的男性有着更高的三孩生育意愿。表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仍在当下的多孩生育意愿方面发挥作用，表现为二孩“女主内”和三孩“男主外”。城乡差异方面，高收入的城市家庭反而比农村家庭有更高的二孩生育意愿。这表明传统的城乡二元生育格局正在消散甚至发生逆转，经济因素在二孩生育中的促进作用，城市反而大于农村。育儿服务在城乡间的可及性和普及性等客观差异可能是当下多孩生育意愿新城二元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说，当下我国育龄群体生育现状在维持原有模式的同时也呈现出新的变化。物质条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收入、幼儿照料和优质育儿服务都是首要考虑因素。就观念而言，虽说性别分工观念对多孩生育意愿仍保持着影响，且正向调节中收入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高收入家庭的三孩生

育意愿,但重男轻女的女性性别偏好已经消失,已有子女的性别构成并不影响多孩生育意愿。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观念仍体现在多孩生育方面,女性在二孩生育上对能否得到父母的支持更为敏感,男性在三孩生育意愿上对经济条件更为敏感。生育意愿上的城乡二元正在消散,甚至在某些方面发生了逆转。这说明,通过经济手段缓解育儿压力,改善育儿环境,城市家庭还是可能倾向于生育二胎的;同时改善农村生育条件,提供相关的公共服务和配套支持,是提高农村多孩生育的关键。

我们认为当下推动多孩生育的政策建构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众对二孩生育意愿呈开放态度,且二孩意愿远大于三孩意愿。多孩生育政策宣传、激励和资源倾斜的重点应在二孩,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前育龄群体的二孩生育潜力。第二,提供直接的经济补贴。为有多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一次性经济补贴,降低育儿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第三,完善祖辈照料支持体系。鉴于隔代照料在缓解家庭育儿压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应完善老年人养老服务体系,为祖辈照料提供政策支持空间。第四,推动城乡同步的育儿服务体系建设。无论是以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还是市场化的方式,都应完善相关的育儿服务配套建设,特别是在育儿服务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进行补弱。总的来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规模小型化以及生育对个人意义的弱化,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的下降不可避免。但生育政策要避免生育率的过度下降,应为有多孩生育意愿的育龄群体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充分挖掘多孩生育潜力。推动支持和兜底型的家庭生育政策,缓解家庭育儿负担,特别是减轻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和育儿方面压力,推动育儿友好型社会的建立,同时将部分家庭育儿功能移交给社会,减轻家庭育儿责任,是当下走出低生育陷阱的重要举措。

(责任编辑:薛立勇)

Research on the Willingness of Childbearing Age Groups to Have Multiple Childre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Material and Concepts —An Experimental Conjoint Analysis Based on CGSS2021

WANG Yijie BAI Yang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phase of low fertility rates. Investigating the genuin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childbearing-age individuals and implementing corresponding policies to unlock the potential for higher-order childbearing is a crucial measure to address population-related challenges. Utilizing data from survey experiment of the 2021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oth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ideational factors on the fertility intentions of having multiple children. The study finds that residents generally hold a somewhat open attitude toward having a second child, but exhibit a more negative inclination towards having a third child. On the material dimension, factors such as household income, parental care support,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high-quality child-rearing services can enhance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multiple children. On the ideational front, gender preferences no longer significantly affect fertility intentions, but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perceptions still exert a positive influence, and they also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household incom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urban-rural divide in material conditions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gender, reflecting a shifting urban-rural dualistic fertility pattern, with economic utility for having a second child being greater in urban areas than in rural areas. Parental provis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willingness among women to have a second child. When economic capacity permits, men express a higher desire for the birth of a third child compared to wome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fertility policies should focus on the potential for second-child fertility, promote supportive family-oriented reproductive policies, establish a child-friendly society, and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reproductive support as the primary direction to break out of the low fertility trap.

Keywords: Material and Concept; The Willingness to Have More Children; Birth Policy; Survey Experiment